

李达与五四时期的思想大论战

宋 镜 明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是通过斗争实现的。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开展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关于社会主义的辩论”以及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就是这种激烈的思想斗争的集中表现。由于共产主义者的团结战斗,三次论战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而告终。我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先驱者李达,除了第一次论战因在国外未能参加外,在后两次论战中,他一直都是站在斗争的最前列,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卓越代表。

(一)

五四运动以后,以梁启超和张东荪为首的研究系分子,眼见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而惶恐不安。他们打着研究“社会主义”的幌子,大肆贩卖基尔特社会主义,提倡社会改良,反对社会革命,妄图阻止共产主义运动的向前发展。

基尔特社会主义就是行会社会主义,是将国家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揉合在一起的旨在抵制社会革命的改良主义理论。梁启超等人请罗素到中国讲学宣扬的就是这种理论。罗素说,基尔特社会主义“可以免掉欧洲资本制度之弊害及俄国不幸命运之事”^①。他反对暴力革命和武装夺取政权,宣扬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认为中国实业不发达,当务之急是发展实业,兴办教育。1920年10月,张东荪陪同罗素到湖南讲演,回到上海后,于11月6日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一篇《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的时评,接着又发表《大家须切记罗素先生给我们的忠告》等文章,进一步宣扬和发挥罗素的反动观点。张东荪学着罗素的腔调,公开宣称:“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增加富力”、“开发实力”,“而不是欧美现成的甚么社会主义”^②。

张东荪的这一反动主张刚一抛出,就遭到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迎头痛击。李达用江春的笔名写了《张东荪现原形》。李达指出:张东荪“有一种人所不能的特长,就是前言不顾后语,自己反对自己。这是因为他善变,所以前一瞬间的东荪,与后一瞬间的东荪是完全相反的”^③,原来他是一个假社会主义者,“自己把假面具揭破了!”“现出原形”^④。李达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共产主义者对张东荪假社会主义开始反击的标志。不久,李达又写了《劳动者与社会主义》和《社会革命底商榷》两篇重要文章,标志着反击假社会主义的斗争日益深入。为了从根本上驳倒假社会主义,李达根据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共产党宣言》和《哥达纲领批判》中的有关原理,首先对社会主义的真义作了明确的解释,指出:“社会主义主张打倒资本主义,废止财产私有,把一切工厂一切机器一切原料都归劳动者手中管理,由劳动者自由组织联合会,共同制造货物。”^⑤社会主义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李达痛斥了张东荪一类“走狗学者”的假社会主义,他说:“社会革命!社会革命的呼声,在中国大陆一天一天的高了。有许多走狗学者也讲起社会主义来了。可是他们只是口头讲,心里未必赞成,也只是胡乱的讲,

却未必十分懂，恐怕这班不久便会连口头赞成都要取消。”“他们是社会主义的障碍，是我们的敌人”^⑥。李达还批驳他们所谓中国无地主资本家、没有阶级区别、不能提倡社会革命的谬论，指出中国不仅有国际的资产阶级、而且有本国的资产阶级，他们对中国无产阶级进行最严重最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农村中“富者田连阡陌，贫者土无立锥”^⑦，“中国田主佃户两阶级的分立，是固有的；现在受了产业革命的影响，又形成了资本劳动两阶级。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的对抗越发显明，无产阶级的贫困增大，有产阶级的财富增加，社会革命的机会到了。”^⑧他在文章中强调说：“社会主义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出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劳动者不饿死不冻死，不受资本家的压迫，因此，“劳动者非信奉社会主义，实行社会革命把资本家完全铲除不可”^⑨。

研究系分子在他们的谬论遭到批判以后，又进行了疯狂的反扑。1920年12月15日，张东荪在《改造》杂志上抛出了《现在与将来》的文章，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反社会主义观点。这篇文章发表不久，梁启超于1921年2月15日发表了《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的长篇论文。他竭力支持并进一步发挥和补充了张的反社会主义观点，实际上提出了一个使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抵制社会主义运动的改良主义纲领。他们反对阶级斗争，反对社会革命，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反对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其目的是继续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社会，不准把中国引上社会主义道路。

梁启超、张东荪的谬论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宣传和中国革命运动的开展是极端有害的，正如《新青年》的一篇文章所指出：“他们这种似是而非的论调”，“一班老顽固见了，必定兴高采烈，把它当作新四书五经互相号召；一班资本家见了，必定欢天喜地，把它登在报纸上，借以骗钱，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把‘罗素博士之名言’登在报上骗钱一样；一班脑筋简单的青年见了，必定为它所惑，对于社会主义不肯加以研究；就是一班欢迎社会主义的青年见了，也未必不呈一种徘徊歧路和裹足不前的状态。”^⑩因此，张、梁的文章发表后，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新青年》和《共产党》等刊物连续发表反驳文章，对他们展开了坚决的回击。在这场反对假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李达是一员坚强的主将。

1921年5月，李达发表了长达13000多字的《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的论文，这是一篇批判假社会主义最有份量的战斗檄文。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次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辩论，实质上就是“表同情于资本家与表同情于劳动者的两派”之争，是“社会主义与反社会主义两方面”之争。梁启超的《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是“主张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一篇代表作。李达的文章就是针对着这篇文字写的。他明确宣告：“我为忠实主义起见，认定梁任公这篇文字是最有力的论敌”^⑪。

李达对假社会主义的反动理论体系作了全面系统的清算。

第一，批判了所谓“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中国无劳动阶级”、不能提倡社会主义的谬论。梁启超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中国和欧美不同，中国“实业不发达”，“产品贫乏，无法均产”；中国“无劳动阶级”，“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而能使多数之人民得以变为劳动者”，“有业无业乃第一问题，而有产无产转成第二问题”^⑫，因此，社会主义在中国行不通。李达坚决批驳了这种谬论，着重指出：“中国工业的发达虽不如欧美、日本”，但“中国无产阶级所受的悲惨，比欧美、日本无产阶级所受的更甚。”^⑬“中国是劳动过剩，不能说没有劳动阶级”^⑭。因此，“社会主义运动的根本原则”，不能因为“中国现时社会实况与欧美略有不同”而改变，它是“不能独异的”^⑮，它也是适合中国的国情的。

第二，痛斥了所谓中国唯一的出路只能是“奖励”资本家“开发实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调言。梁启超认为奖励资本家“开发实业”，发展资本主义，使“游民”有工可做，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并胡说只有先通过这个办法“造成”劳动阶级，然后社会主义才有“凭借”^⑩。李达指出，社会主义者并不反对开发实业，问题是用什么方法去开发实业，什么是中国的真正出路。他分析对比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本质区别，论证了世界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历史趋势，指明了把中国引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在文章中说：“将来社会的经济组织必归着于社会主义”^⑪，“在今日而言开发实业，最好莫如采用社会主义。”^⑫他进一步指出，在帝国主义互相争夺下的中国，要想发展资本主义，“恐怕要糟到极点了，梁任公认此是唯一可行之道，我看这唯一可行之道，反不免是空想罢。”^⑬帝国主义决不会帮助中国发展实业，不会让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而是要使中国永远成为它们的殖民地。

第三，揭露了所谓“矫正资本家”、“务取劳资协调”的欺骗性。梁启超声称要“唤起”资本家的“觉悟”去“矫正”资本主义的“弊病”，以缓和劳资两阶级之矛盾^⑭，企图使社会主义运动纳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轨道。对此，李达尖锐指出：社会主义运动是要“完全撤废”“自由竞争和私有财产”这个“现社会中万恶的根源”，而改良主义的社会政策只是“略略缓和社会问题，并不是想根本的解决社会问题的。”^⑮“劝诱”资本家“宽待劳动者”，只能使劳动者永远“呻吟于资本家的掠夺支配之下”，资本家是决不能靠空话“劝诱”就会觉悟的。“他们宽待劳动者，无非是免得受罢工的损失，即可以安稳的扩张资本势力；换句话说，即是使劳动者安于奴隶状态而不思反抗。”^⑯

第四，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的原理。在同假社会主义者的斗争中，李达对社会革命的涵义、社会革命的根源和目的，以及社会主义运动的内容及其实现的手段等问题，都作了充分的论证。李达指出：“马克思所说的社会革命，就是使社会的组织完全解体的意思”^⑰，由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代替另一种社会形态。他指出：“社会革命就是为实现社会主义而行的革命。”^⑱“社会革命不是在哲学中探求而得的，乃是发生于社会的经济状态之变动。”^⑲李达进一步分析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内容和社会革命的目的，指出：“社会主义运动，就是用种种的手段方法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⑳“社会革命的目的，在推倒有阶级有特权的旧社会，组织无阶级无特权的新社会”^㉑，即推翻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李达着重论述了实现社会革命的根本手段，明确指出：要达到社会革命目的，“概括的说起来，就是厉行非妥协的阶级斗争”^㉒。为了揭露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欺骗性和反动性，他深入分析比较了议会政策、工会运动和直接行动三种不同的具体手段，认为议会政策在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下“难以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㉓无产阶级的议员要想在议会中通过一项除去自己阶级痛苦的法案，“是断然办不到的”^㉔。工会运动也“不能算作社会运动唯一的手段”^㉕。只有“直接行动”才“可以称为社会革命的唯一手段”^㉖。所谓直接行动“就是最普遍最猛烈最有效力的一种非妥协的阶级斗争手段。”^㉗他强调指出：“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主张联合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增加作战的势力，为突发的猛烈的普遍的群众运动，夺取国家的权力，使无产阶级跑上支配阶级的地位，就用政治的优越权，从资本阶级夺取一切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到无产阶级的国家手里，用大速度增加全部生产力，这就是直接行动的效验。”^㉘通过上述三种手段的分析比较，李达得出结论：“要采用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㉙而要采用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他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务必努力做到：“一，网罗全部劳动者失业的劳动者，组织社会主义的工会，为作战之训练。二，培养管理支配生产机关的人才。三，结合共产主义信仰者，组织巩固之团体，无论受国际的或国内的恶势力的压迫，始终为支持共产主义而战。四，社会党人不与现政党妥协，不在现制度下为政治活动，要行有效的宣传为具体的准备。”^㉚这里不

仅阐发了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而且也指明了建党的必要性。

五四时期开展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这一场大争论，是中国应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是采用革命的方法还是采用改良主义方法来改造中国的大争论。在这场大争论中，李达最早参战，发挥了先锋作用和骨干作用，是马克思主义一方的主要代表。李达和其他早期共产主义者一起，剥开了梁启超、张东荪伪装的社会主义的画皮，划清了真假社会主义的界限，保卫了社会主义旗帜，促进了我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

(二)

在同研究系的假社会主义进行论战的同时，李达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又投入了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

无政府主义是打着共产主义招牌同马克思主义相敌对的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潮。在我国这个小生产者占绝对优势的国度里，它有着广泛深厚的社会基础。

五四运动以前，无政府主义在当时的各种“社会主义”流派中占着优势。一部分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受它的影响很深。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它曾经在一定程度上对封建思想和军阀政治起过冲击作用。但它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却起着混淆视听、以假乱真的破坏作用。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深入传播，无政府主义的反动性更加暴露无遗。从1919年到1921年，以黄凌霜、区声白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发表《马克思学说的批评》、《我们反对“布尔扎维克”》等许多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他们鼓吹以个人为中心的“绝对自由”，宣扬社会的“绝对平均”，反对一切权威，反对一切强权，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特别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建立有严格组织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他们还反对“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主张立即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他们披着共产主义的外衣，向马克思主义公开挑战。这种反动思潮，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危险敌人，成了中国共产党建党过程中必须扫清的障碍。只有对无政府主义进行彻底批判，才能引导更多的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青年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也才能使共产主义者的队伍——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更加纯洁和巩固。

从1920年起，当时的共产主义者以《新青年》和《共产党》为阵地，展开了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李达也积极参加了同无政府主义的论战，他是站在马克思主义方面的主要代表之一。

早在1919年6月，李达发表的《什么叫社会主义？》，就对无政府主义开始进行批判。1920年11月以来，李达主编的《共产党》月刊从第1号到第5号的《短言》都批判了无政府主义。特别是12月和次年5月，李达发表了《社会革命底商榷》和《无政府主义之解剖》两篇很有影响的文章，有力地驳斥了无政府主义的荒谬主张。

第一，他批驳了所谓“一切国家都是祸害”的谬误，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无政府主义者极力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他们不承认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硬说国家是人类互相“仇视”和“相侵相夺”、“相杀相害”的根源；他们无视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本质差别，硬说二者是一样的。因此，他们标榜反对一切国家，反对一切强权。针对无政府主义这种谬论，李达首先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他援引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观点，指出：“国家是阶级支配的一个机关，是一阶级压迫他阶级……的机关”。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国家是一定发展阶段之中的社会的一个产物；是阶级的冲突和经济的利益不能和协的一个证据。”^⑦据此，李达批驳了所谓“一切国家都是祸害”的谬误，

指出必须区别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国家。他认为，说资产阶级的国家是特权阶级的国家是可以的，若说无产阶级国家也是特权阶级的国家便不对了。“若嫌特权阶级的国家不好，只好把特权阶级打倒建设无特权阶级的国家就好了。”“若说一切国家都是特权阶级国家，就不免是独断了。”^③这就从理论上驳倒了无政府主义的国家观。

同时，李达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作了论述。他引证了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的一段话：“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④，说明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他又引证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的名言：“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⑤据此，他明确提出：“资产阶级的独裁只能变为劳动阶级的独裁政治”^⑥，即资产阶级专政只能为无产阶级专政所代替。为了镇压敌人的反抗和防御外国的入侵，“监狱也要”，“警察也要”，“军队也要”^⑦。李达主编的《共产党》月刊第5号发表署名文章，公开宣告：“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拿国家建树无产阶级的特权，是要拿国家来撤废一切阶级的。”^⑧

第二，揭露了所谓“绝对自由”的欺骗性，剖析了无政府主义的反动世界观。在自由问题上，无政府主义者鼓吹“绝对自由”。它的代表人物黄凌霜说：“社会主义，不应当压制个人的自由”，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抹杀个人”、“滥用强权”、“独裁专制”^⑨。它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区声白也说：“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是自由组织的，人人都可以自由加入，自由退出。”^⑩李达深刻地揭露了这种谬论的欺骗性和反动性。他指出：“无政府共产社会”是“空中楼阁”^⑪，不要中央集权是“蔑视时间空间的空想”^⑫。“绝对自由”、“绝对平等”的抽象思想是没有的。他写道：“实在的说起来，资本阶级并不怕人提倡什么绝对自由绝对平等的社会那种抽象的思想，他们所怕的，还是那种最有力的具体的即时可以实现的社会主义制度。”^⑬个人的“绝对自由”和社会的“绝对平等”是有利于资产阶级不利于无产阶级的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李达还追根溯源，抓住要害，揭露各派无政府主义共同的根本错误及其个人主义的世界观，点明无政府主义各派的共同要素，“就是否认一切政府，一切国家，一切权力”^⑭。列宁说：“无政府主义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无政府主义整个世界观的基础。”^⑮李达正是抓住世界观这个根本问题进行批判的，尖锐指出无政府主义的鼻祖施蒂纳“所创的无政府主义是极端的无政府主义，又是极端的个人主义”。“他否认一切政府，否认一切国家。”“他连社会都要否认的。”“他要无限制的发挥自我。”“我要上天就上天，我要入地就入地。”^⑯李达又指出：“普鲁东的无政府主义明明是准据个人主义的。”“他的无政府主义是没有科学的体系和哲学的基础的。”^⑰“巴枯宁的团体的无政府主义，在理论上不能成立。”“他的无政府主义主张，是从对于国家和教会的感情上的偏见发生出来的。”^⑱“克鲁泡特金是无政府主义的集大成者。”^⑲“克氏的思想，也和那些把小我人格与大我人格合为一致的人的思想相似，一大半可以当作宗教看的”，几乎“都是迷信、空想”^⑳。李达通过对无政府主义各种流派的批判得出结论说：“能够成为无政府主义的只有个人主义。”^㉑中国无政府主义的主要代表黄凌霜也供认不讳并公然宣称：“无政府主义以个人为万能”，“无政府主义乃是个人主义的好朋友。”^㉒所以，无政府主义者实质上大多是一些在革命词句口号掩盖下的极端个人主义者。

第三，批判了生产管理上的分散主义和分配上的绝对平均主义观点。在生产问题上，李达指出：“无政府主义的生产组织是分散的”，“主张破坏中央的权力，要将一切生产机关，委诸自由人的自由联合管理”；无政府生产组织的最大缺点是“不能使生产力保持均平”，是“无政府的状态”^㉓，“与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差不多”；^㉔

在分配问题上，李达批判了无政府主义者不顾社会的发展阶段和生产力水平而主张立即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空谈，阐述了在社会主义阶段只能实行“按劳分配”的原理。他指出：按需分配“非待世界的产业发达到极境的时候，不能办到”；只有“社会的生产力发达到无限制的程度，生产物十分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才“可实行”；在“生产力未发达的地方与生产力未发达的时期内，若用这种分配制度，社会的经济的秩序就要弄糟了。”^⑩

李达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系统深刻，击中要害。

五四时期的社会思潮错综复杂。中国是小生产为主体的国家，众多的知识分子出身于小资产阶级或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他们所处的生产方式和阶级地位，决定他们自发地倾向无政府主义。正如斯大林所说：“这个阶层是滋长各种无政府主义派别、半无政府主义派别和‘极左’派别的最好土壤。”^⑪因此，五四时期不少知识分子特别是知识青年信奉无政府主义。他们在探求中国的出路时，往往把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系在一起，向西方学习。可是，由于理论上的不成熟，分不清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界限，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无政府主义当作马克思主义加以宣传。鉴于这种情况，李达非常注重思想教育。在批判无政府主义时，他把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和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严格地区别开来；对无政府主义的理论观点毫不留情地给以彻底批判，但对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人们却是热情帮助，争取他们提高觉悟，转变立场。他写作《无政府主义之解剖》时，一开头就申明：“无政府党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我们的同志”^⑫，批判无政府主义的目的是“要约同这些朋友们加入我们的队伍里，共同对世界资本主义作战，共同剿灭世界资本制度，以便早期实现社会主义社会”^⑬。李达殷切希望那些要求革命的朋友，务必择定可以通行的正确目标前进，“不要向着那不可通行的道路上前进，免得耗费有用的精神于那于革命无益的事。”^⑭这对于促使信奉无政府主义的人们的觉醒，无疑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五四时期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持续了一年多时间。这场斗争，实际上是关系到建立什么样的党的争论。是建立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实行民主集中制、具有严格组织纪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还是建立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主张“绝对自由”、不受任何纪律约束的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党？这便是争论的实质。由于李达和其他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共同努力，经过这场斗争，剥夺了中国无政府主义的思想理论武装，基本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它不仅使原来信奉无政府主义的大多数知识青年转变了立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而且纯洁了共产主义者的队伍，把当时混杂在共产主义小组中的极少数顽固不化的无政府主义分子清除出去，这就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为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优势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成长铺平了道路。经过这场斗争，马克思主义取得了胜利，并在中国思想界确立了优势地位，共产主义者明确了在中国应该建立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主义政党而不是无政府党。因此，这场斗争的胜利对于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注释：

① 罗素：《社会主义》，载1921年2月22日《时事新报》。

② 张东荪：《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载1920年11月6日《时事新报》。

③④⑤⑥⑦⑧⑨ 《李达文集》第1卷，第24、26、41、46、47、48、41页。

⑩ 李季：《社会主义与中国》，载《新青年》8卷6号。

⑪ 参见《李达文集》第1卷，第57—58页。

关于我国思想库建设的思考

李 光

改革之年的中国又迎来了新春。怎样使我国的改革向纵深发展?如何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这是每一个具有责任心、紧迫感的炎黄子孙所关心的问题。为了振兴中华,促进我国科学、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良性循环,我们有必要深刻认识现代思想库对决策科学化的重要意义,并且从速建立和完善我国的思想库体系。

思想库(Think Tank)也称之“智囊团”、“脑库”等等,它是现代咨询机构的形象化代称。作为有效的咨询服务机构,思想库主要为现代社会的决策科学化服务。人类社会的决策活动源远流长,已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追溯历史,决策与“咨询”、“智囊”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国南宋洪兴祖在《楚辞补注》中,对东汉王逸哀悼屈原之佳句“纷载驱兮高驰,将咨询兮皇羲”诠释时,云“皇羲,羲皇也。咨,问。询,谋”。其意为屈原离世远去,将与发明阴爻、阳爻的八卦祖师伏羲谋议。在《汉书·晁错传注》中,唐朝颜师古将“智囊”解释为“言其一身所有皆是智算,若囊橐之盛物也”。在漫长的封建社会,究其实质而言,决策主要是由个人的意志和主观能力所决定,表现为皇帝“受命于天,朕即国家”,违圣旨者问罪。即使是小小的七品知县也可自称“父母官”,亦有为民作主之说。诚然,封建社会的统治者身边也不乏“谋士”、“智士”、“策士”、“咨议”、“参议”等人,但这些决策者的“外脑”处于当时的文化背景中,不仅易受专制政治以及决策者个人素质的制约,而且也受自身素质的制约,其作用的发挥是非常有限的。

⑫⑬⑭⑮ 参见梁启超:《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载《改造》3卷6号。

⑯⑰⑱⑲⑳ 《李达文集》第1卷,第62、67、63、64、65、66页。

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 《李达文集》第1卷,第68、69、203、232、47、62、52、52、52、53、72、56、72、72—73、73、74、102、83页。

㉟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34页。

㊱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页。

㊲④⑤⑥⑦⑧⑨ 《李达文集》第1卷,第88、90、88、87、88、80页。

㊳ 施存统:《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载《共产党》5号。

㊴ 凌霜:《马克思学说批评》,载《新青年》6卷5号。

㊵ 区声白:《讨论无政府主义》(通信),载《新青年》9卷4号。

㊶ 《列宁选集》第1卷,第218页。

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 《李达文集》第1卷,第81、82、84、84、89、90、49、50、51、78、78、79页。

㊳ 黄凌霜:《评〈新潮〉杂志所谓今日世界之新潮》,载《进化》第2号。

㊴ 《斯大林选集》上卷,第502页。